

“標準人”的製造：  
ABT 應用中的技術權力問題  
The Manufacturing of “Standard  
People” : Technical Power  
Issues in ABT Applications

蔡 昱

Cai Yu

Abstract

The paper by David M. Lyreskog et al. explores the ethic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ABT will bring. The findings are enlightening. This article provides insight into a possible technical power issue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ABT, namely the manufacturing of “standard people,” includ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emotions, which may stifle creativity. When assisting people’s thinking and cognition, ABT may overlook the correlation of

---

蔡 昱，雲南財經大學金融研究院教授，中國昆明，郵編：650221。  
Cai Yu, Professor, Fina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China, 650221.

《中外醫學哲學》XXI:2 (2023 年)：頁 65–6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1:2 (2023), pp. 65–68.

© Copyright 2023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emotional reactions and cause harm to humans. ABT may also obtain standard behavior patterns through big data statistics and use them to shape humans. Obviously, such situations constitute an abuse of technical power.

David M. Lyreskog 等人的論文 (Lyreskog et al. 2023, 11–34) 對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領域，即作為 BCI 和 AI 的融合的人工智能-腦機介面技術 (ABT) 將帶來的倫理問題進行了探討，其視角包括自主性、心理完整性、身分、資料的隱私和控制，兒科領域的應用和作為人類增強手段所帶來的問題等，很具有啟發性。正如上文所論述的，當 ABT 以某種方式協助人類的情感和認知時，上述倫理問題就更加凸顯出來。毋庸置疑，ABT 作為極少數人才能夠真正理解的高精尖的生命技術，其研究人員和應用人員相較於普羅大眾，具有絕對的控制性的優勢地位，即具有技術權力，而上文中所論述的倫理風險，也可被認為是 ABT 的應用所帶來的技術權力濫用問題。進一步地說，這種技術權力的濫用有可能製造“標準人”，從而扼殺人的創造性，抹殺人的個體性。

首先，ABT 的應用中，可能忽略情緒反應和思維認知的相關性，從而產生倫理問題。具體而言，不同的人類個體所具有的情緒反應模式和思維模式是不同的，基於這些與眾不同的“硬體”，人們成為“與眾不同”的人，即具有不同的天賦和個性，並由此呈現為人類的多樣性。需要注意的是，情緒反應和思維方式常常是相互適應和相互配合的，ABT 的應用中如果忽略這種相關性，就可能給人類帶來傷害。一方面，是情緒的“標準化”可能扼殺人的創造性。例如，焦慮對推動人的創造性思維是有幫助的，因此，對於創造性思維較為活躍的人來說，其焦慮的發生必然比創造性思維弱的人更加頻繁，無論是在藝術、科學或人文領域，都是如此。然而，當人們用 ABT 協助情感調節時，就可能武斷地認定某種程度的焦慮是“正常”的，超過此種閾值的情況就是“非正常”的，是需要干預的，由此，就可能扼殺人的創造性，尤其當個體的天賦尚未被“看見”，而其“焦慮”卻被“看見”

時。顯然，這是典型的科技權力的濫用。另一方面，當 ABT 用於協助人的思維和認知時，同樣會因忽略了情緒反應的相關性而對人類造成傷害。具體而言，當 ABT 做出此種協助時，尤其是作為人體增強的手段（即其目的是使人變得更“聰明”）時，必然增加大腦承載的信息量。顯然，ABT 作為人工智能是可以無限載入的，但人的情緒系統卻很可能無法承受這樣的資訊超載，由此會造成焦慮、抑鬱等情緒問題，甚至崩潰。

其次，ABT 還可能通過大資料的統計而得到“標準的行為方式”，並以此作為“正常”來形塑人類。然而，這裡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大資料只是一種對現象和現象中的因果關係和相關性進行描摹的技術。因此，它對人的行為模式和造成此行為方式的境遇並沒有反思性和批判性，其（非反思性和非批判性的）潛在假設是“大多數=正常”，即“少數=異常”。此處，“異常”就暗示了一種“被排斥”的社會暴力。進一步地，如果說“異常”的標籤在當前只是一種脅迫和規訓，則 ABT 的出現有可能使得此種“偏差”的“校準”以 ABT 的實質性的“矯正”來實現，這就使人成了具有“標準的行為模式”的“標準人”。由此，不僅實現了對人的操控，實現了社會對人類個體的“去個體化”和“削平一切”的要求，還會反向承認那些塑造了“大多數人”的制度、文化和環境的合理性，即反向加強了它們。顯然，這是典型的技術權力的濫用。更加危險的是，這種“矯正”可能是在“無聲無息”之中進行的。正如 David M. Lyreskog 等人的論文中所提及的，ABT 可以幫助我們從思想到行動，或者實際上思考和解釋思想本身，但人類和機器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演算法可以分析神經活動模式，並向大腦發送刺激，這些刺激會微妙地影響情緒、欲望或信念，但不會上升到有意識的意識水準。也就是說，ABT 可以“無聲無息”地塑造思維和行為。

##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萊瑞斯科、佐赫尼、辛格、薩烏萊斯庫：〈與機器一起思考：腦機介面技術〉，《中外醫學哲學》，2023年，第XXI卷，第2期，頁11–34。  
David M. Lyreskog, Hazem Zohny, Ilina Singh, Julian Savulescu. “The Ethics of Thinking with Machines: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1, no. 2 (2023): 11–34.